

---

# 国民党消极抗战起始于何时?

张设华

---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国民党在八年抗战中经历了一个由积极抗战到消极抗战的变化过程。但是,国民党消极抗战究竟起于何时,却有不同的说法。本文拟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并就教于同行学者。

## 一 两种难以成立的说法

国民党消极抗战到底从何时开始?对此有两种说法。一种以武汉会战结束为转变标志,一种以太平洋战争爆发为转变标志。

第一种说法分析武汉会战以后国民党抗战转向消极的主要表现是:第一,在日本诱降政策下,国民党与日本秘密谈判,进行妥协活动;第二,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说抗战到底就是恢复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把东北四省置于抗战目标之外;第三,国民党把主要兵力集结于西南西北大后方,不主动向敌进攻,实行单纯防御的战略,保存军事实力,坐待国际形势变化,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外援和英美等国参战;第四,实行积极反共政策,把主要精力用于对付共产党,实行“溶共、限共、防共、反共”的方针,不断制造反共军事摩擦。

对以上的观点,笔者以为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第一,关于国民党与日本谈判进行妥协活动的问题。首先,国民党与日本谈判进行妥协活动是从1937年11月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中日战争就已经开始的。既然抗战初期有了谈判妥协活动而不被称为消极抗

战,那么进入相持阶段有了谈判妥协活动就被看成是消极抗战便不合乎逻辑。其次,蒋与日本进行谈判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使日本延缓承认汪伪政权之策略考虑,他以日本不得承认汪伪政权为谈判先决条件,使汪伪政权在很长的时间里得不到日本政府的承认。这一点连日本人都感到上当受骗了。第二,关于抗战到底的界限问题。蒋在1939年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上进行了解释,蒋说:“我在五中全会说明抗战到底,要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是根据以中国为基准的说法;若以整个国际为范围来论断中日战争的趋势,就一定要坚持到世界战争同时解决,乃能有真正的解决。”<sup>①</sup>至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界限:“与暴敌抗战到底,非至驱逐敌军于我国境之外而不止。”<sup>②</sup>第三,中国军队的主力不仅配置在西南西北大后方,而且有三分之一的部队开赴敌后进行游击战争。据陈诚称,到1939年1月,“我们在敌人后方的兵力至少有百万以上”。<sup>③</sup>国民党的抗战战略方针也不是单纯防御性的,而是整训部队,积蓄力量,完成反攻准备,并进行了反攻。1939年至1940年初,国民党军发起的四月攻势、七月攻势、九月攻势和冬季攻势就是例证。因此,还不能断言国民党保有军事实力用于反共方面。第四,积极反共的活动不断出现,是抗战初期所没有的。但其主要方针是溶共和限共,用三民主义来溶化共产党,在政治范围内解决共产党问题。国民党五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共中央派王明等与蒋谈判以解决国共关系问题。蒋认为此问题的解决应是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组织加入国民党,或取消共产党组织整个加入国民党,决不许象大革命时期那样的跨党。<sup>④</sup>蒋在五中全会上说:“我们

---

① 中国文化大学编印:《蒋总统蒋公全集》,台北中华学术院1984年10月版,第1343—1344页。

② (重庆)《新华日报》1940年7月11日,第2版。

③ 陈诚:《抗战二年来几个根本问题的检讨》1939年7月7日讲稿。

④ 陈绍禹等关于一个大党问题与蒋介石谈判情况向中央的报告,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11册。

对中共不象十五、六年那样,而应该采取不打它,但也不迁就它,现在对它要严正——管束——教训——保育——现在要溶共——不是容共。它如能取消共产主义我们就容纳它。”<sup>①</sup>所以‘继续抗战和联共抗战’的大局未变。从以上分析可见,持第一种说法的理由是不充足的。

持第二种说法的代表是日本的石岛纪之。他认为:“1941年以前,国民党确实是加强了反共,但未必能说对抗战已变成消极的了。”他举出这个时期中国军队反击日军的典型事例,是冬季攻势。认为1940年国民党军死伤人数剧增主要是由此造成的。而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把战争胜败委诸美英等盟军,对抗战就十分消极了。从1941年起,国民党军伤亡人数逐年减少表明了其对抗战的消极趋势(见表一)。故他认为国民党消极抗战应以太平洋战争爆发为转变标志。<sup>②</sup>

表一:抗日战争中国军队伤亡统计表

| 年代    | 阵亡     | 负伤     | 合计     |
|-------|--------|--------|--------|
| 1937年 | 125130 | 224232 | 349362 |
| 1938年 | 249213 | 485804 | 735017 |
| 1939年 | 169652 | 176891 | 346543 |
| 1940年 | 339530 | 333838 | 673368 |
| 1941年 | 144915 | 137254 | 282169 |
| 1942年 | 87719  | 114180 | 201899 |
| 1943年 | 43223  | 81957  | 125180 |
| 1944年 | 102917 | 103596 | 206513 |

① 转引自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43页。

② 石岛纪之:《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中国战线》,见《国外近代史研究》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        |         |         |         |
|--------|---------|---------|---------|
| 1945 年 | 57659   | 85583   | 143242  |
| 合计     | 1819958 | 1743335 | 3063293 |

石岛先生的观点有偷换概念的错误。因为国民党军伤亡人数减少是 1941 年开始的,而太平洋战争爆发于 1941 年 12 月 8 日。1941 年和 1941 年 12 月 8 日是两个不同时间概念,若以伤亡数字减少为依据,按石岛先生的逻辑,则应以 1941 年作为国民党消极抗战开始的标志,而不是 1941 年 12 月 8 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因此这种说法也难以成立。

由上分析可见,目前关于国民党消极抗战开始于何时的两种说法难以成立,有重新再探讨的必要,而笔者认为,国民党消极抗战应以 1940 年初中国军队冬季攻势失败为转变标志。

## 二 1938 年 11 月至 1940 年初国民党抗战仍是积极的

武汉会战后,国民党召开了南岳军事会议,指出第二期抗战战略指导方针是“转守为攻转败为胜”,应一面在战场上继续与日军进行消耗战,一面积积极整训部队,训练全国壮丁,并开辟敌后游击战场,待新的抗战力量培训完成,即举行大规模反攻。蒋决定把全国部队分三批,在一年之内分三期整训,派全国三分之一的部队开赴敌后进行游击战。并颁令《国军第二期作战指导方案》,其战略方针和军事部署是:“国军应以一部增强被敌占领地区内力量,积极展开广大游击战,以牵制消耗敌人。主力应配置于浙赣、湘赣、湘西、粤汉、平汉、陇海、豫西、鄂西各要线,极力保持现在态势。不得已时,亦应在现在线附近,尽量牵制敌人,获取时间之余裕,俟新战力培养完成,再行策动大规模攻势。”<sup>①</sup>就是以空间换时间,以培养

<sup>①</sup>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争》上,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2 页。

新的抗战力量，完成反攻准备工作后即进行大规模反攻。对此，何应钦说得更明白：‘国军第二期作战，一面维持并造成我军有利态势，继续消耗敌人，一面积极整训部队，培养战力，待机转取大规模攻势，以驱逐侵入之敌。’<sup>①</sup> 陈诚也说：‘武汉撤退以后，最高统帅部便开始有计划有步骤的举行各项训练……虽然性质各异，但都是同样的注意训练，准备充实力量以举行总的反攻。’<sup>②</sup>

有人把国民党整训部队说成是保存军事实力。这种说法值得斟酌，因为整训部队之目的是为反攻做准备，就在1939年11月中国军队完成两期整训之后，国民党军队发起了大反攻——冬季攻势。反攻的主要目标是收复武汉及其外围长江中游地带失地，包括武汉、南昌、岳阳、信阳等城市，击溃日军驻扎在此地区的第十一军。蒋在给白崇禧的电报中谈到此构想时说：‘敌军在湘鄂皖赣与豫南者，其后方交通路线，只有长江水道之一路，此即敌军最大之弱点，如果此长江交通果为我节节截断，或时时打击，则其长江两岸之部队乃成为瓮中之鳖，即可一网打尽，故以后战略之要点特别注重第三战区如何使之截断敌军之长江交通……如果此计果得实行，则解决南京以西之敌军，不成问题。’<sup>③</sup> 蒋在冬季攻势电报中命令：‘从现在起至三月止，我第三、第五、第九各战区部队，须协同一致，将南京以西之敌驱至长江下游。’由第三战区‘闭塞长江之交通’<sup>④</sup>，关闭长江大门，与此同时，由第九、第五战区分别从南北方向向日军第十一军攻击。国民党对冬季攻势作了较为充分的准备，动员参战部队超过全国一半，即192个师，其中用于战场攻击的达

---

① 何应钦：《对五届六中全会军事报告》，见《何上将抗战期间军事报告》上，四川大学图书馆藏。

② 陈诚：《抗战方略》，1939年3月1日在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讲话。

③ 蒋委员长二十八年十月致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蒸电，（台湾）《近代中国》第12期，第82页。

④ 《廿八年十一月十九日下达之冬季攻势命令》，见《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45—47页。

132个师 148万余人,远远高于处于守势的60个师75万人。<sup>①</sup> 这充分说明整训部队是为了反攻,而非保存实力,也说明武汉会战后国民党的抗战方针不是单纯防御性的,而是确实搞过反攻。

1938年11月至1940年2月是国民党抗战第二期第一阶段。在这段时间里,进行了御敌的南昌会战、随枣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和桂南会战。主动发起大攻势4次,即四月攻势、七月攻势、九月攻势和冬季攻势。这期间大小战斗9660次<sup>②</sup>,占八年抗战会战战斗总次数40170次的24.06%,几占1/4。直接与日军交战的军队概数达160余万人<sup>③</sup>,较之1937、1938年有过之而无不及。1937年淞沪会战和太原会战参战的国民党军分别是75万和28万,合计不过103万人。1938年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参战的分别是45万和106个师又2个旅(约100余万<sup>④</sup>),合计在145万以上。因此可以说,1938年11月至1940年2月间仍是国民党军参战人数量最多的时期之一,而且对敌人的打击是很沉重的。如表二所示,1939年日军侵华部队死亡人数与1938年相近,都是8万余人。可见,这一时期也是八年抗战歼敌最多的时期之一。日本人也认为,在华北“共产军已成为必须注意的势力”的同时,中国主要部队仍“为国民党系统的军队”。<sup>⑤</sup> 这时,国民党军仍还是抗战的主要力量,国民党战场仍还是抗战的主要战场。

表二:抗日战争中日军队死亡统计

| 年代    | 中国军队   | 日本军队  | 中国军的损失倍率 |
|-------|--------|-------|----------|
| 1937年 | 125130 | 51230 | 2.2      |

① 此处数字引自张秉均:《中国现代历次重要战役之研究——抗日战役之述评》(续),台北“国防部”史政局1980年印,附表四。

② 何应钦:《对五届七中全会军事报告》,见前引书。

③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21页。

④ 《八年抗战史略——中日二十二次大会战经过简表》,台湾及海外中文报刊专辑《中国历史研究》第1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

⑤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第522页。

|        |         |        |     |
|--------|---------|--------|-----|
| 1938 年 | 249213  | 88978  | 2.3 |
| 1939 年 | 169652  | 82019  | 2.1 |
| 1940 年 | 339530  | 68327  | 5.0 |
| 1941 年 | 144915  | 36207  | 4.0 |
| 1942 年 | 87719   | 27841  | 3.1 |
| 1943 年 | 43225   | 31905  | 1.2 |
| 1944 年 | 102917  | 50185  | 2.0 |
| 1945 年 | 57655   | 47051  | 1.2 |
| 合计     | 1319956 | 483706 | 2.7 |

这一时期,中国军队除主动向敌发起4次大攻势外,还派遣三分之一的军队开赴敌后进行游击战,迫使日军必须同时两面作战,在前方应付正规军,在后方应付游击队,使中国很大程度上扭转了战场上的被动挨打局面而掌握了作战主动权,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也明显增强。1939年与1938年相比,中国军队死亡人数减少了32%,而日军只减少了大约8%,即中国军队只用了不到1938年损失的七成而使日军的损失接近1938年的数字。

1938年12月日方制定《对华处理方略》规定:“为防备以后国际形势转折,对驻屯兵力及现地消耗均应力求紧缩节省。”而实际上,1939年底在华日军(除东北外)达25个师团又20个混成旅团(合计折算35个师团),比年初的24个师团又4个混成旅团(折算26个师团)增加了9个师团。<sup>①</sup>武汉会战前,“日军平均每天前进约四公里,到1939年底,平均每天前进只有二百公尺”<sup>②</sup>,明显暴露日军攻势的不利。1938年11月至1940年2月对日军来说是损失

①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第460页。

② 蒋永敬:《对日八年抗战经过》,见《中国现代史论文选辑》,台北久洋出版社1985年版,第605页。

和消耗继续增长,作战主动权并未掌握和对国民党军的打击显著减弱的时期。日方也不得不承认:“这在整个中国事变中成为陆军最暗淡的时代”。<sup>①</sup>到1940年初冬季攻势结束以前的国民党抗战,仍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

### 三 冬季攻势失败后国民党抗战逐渐转向消极

冬季攻势的失败实际上宣告了国民党速胜论的失败。蒋曾认为中国抗战三年即可告成。<sup>②</sup>陈诚更认为:“今后至多不过二年,抗战即可告成。”<sup>③</sup>这种速胜论观念,违背了战争规律。冬季攻势失败后,1940年2月,白崇禧报告抗战形势时说:“纠正速胜心理,坚持长期奋斗,抗战到底才能争取最后胜利。”他重申了国民党最高战略为持久抗战,并指出在持久战中胜利的条件有三:“一是自力更生的坚忍奋斗,努力把敌人打走;一是消耗敌人的物力财力,促成敌人的崩溃;一是静候国际间更有利形势的到达,以世界的力量,共同解决横暴的日寇。”<sup>④</sup>从表面上看这些话冠冕堂皇,其实就是采用拖的办法,苦撑待变,等待国际形势变化,以世界的力量,共同解决中日问题。这种心理使冬季攻势之后的国民党抗战逐渐变得消极。

首先在战略上,完全是退到抗战初期单纯防御战的姿态,再也没有举行过反攻或较大规模的进攻,固守大西南大西北,苦撑待变。国民党高层虽然也多次谈到要举行反攻,但实际在战场上,除1941年9、10月第六战区局部性地进攻过宜昌之外,其它均未实施,作战主动权也丧失殆尽。这从战场的具体表现也可以看出。

①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第523页。

② 《蒋委员长在重庆接见美国驻华大使詹森谈话纪录》,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一),第100—103页。

③ 陈诚:《抗战二年来几个根本问题的检讨》,1939年7月7日讲稿。

④ (重庆)《新华日报》,1940年2月22日。

1940年6月以后,法国在欧战中失败,向德国投降,英军自欧洲大陆撤回国内,日本乘机压迫英法两国封闭越南和缅甸对中国的交通。从6月20日起,滇越铁路完全封闭;7月8日开始,滇缅交通亦断绝3个月。中国对外交通完全中断,物资更加枯竭,军队“往往一套士兵装备,分配与三人使用”。<sup>①</sup>在国内,5、6月间,日军发动枣宜战役。6月12日,四川门户——宜昌失陷;同时,日军对陪都重庆实施“疲劳轰炸”。此后,国民党把防御重点放在宜昌以西地区,蒋说:“以此时防制敌军攻川为最重要急务也。”<sup>②</sup>国民党军已完全陷入被动,完全是“苦撑待变”。对此,蒋在1941年6月也不得不承认:“盖敌军自去年对我各战区轮流反复不断的扫荡以消耗我兵力,使我无休养整补之暇,不能对敌作整个反攻之计,彼敌自此方略实施以来,我军即处处立于被动地位,我军且未能有一次之反攻,始终任敌来攻,而我军屡次出击计划,也未能实施一次。”<sup>③</sup>冬季攻势也就成了国民党战场最后一次反攻。正如美国学者易劳逸所说:“1939—1940年的冬季攻势后,蒋介石至少是暂时地回复到纯粹防御的姿态。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后,他彻底放弃了任何对日进行持续攻势的念头。”<sup>④</sup>从表二也可看出,从1940年开始,国民党军毙敌人数日趋减少,也间接反应了其消极抗战的趋势。

其次,国共关系不断恶化,蒋决心保存军事实力以便战后对付共产党。1940年3月1日,蒋在日记中写道:“共党如不安分守纪律,我政府决不能听其叛国。至于俄国是否接济,乃不在我心中。吾人决不对外有所希求,更不可迁就外援而贻内患也。”<sup>⑤</sup>7月,国民党提出了一个取消陕甘宁边区,限制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及作战区

① 何应钦:《八年抗战与台湾光复》,黎明文化公司1981年印,第70页。

② 蒋委员长致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电示,《近代中国》第17期,第130页。

③ 蒋委员长三十年六月十四日致军令部长徐永昌电示,《近代中国》第13期,第62页。

④ 易劳逸:《蒋介石与蒋经国》(中译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第174页。

⑤ 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台北)“中央日报社”印,第2691页。

的“中央提示案”。10月以后,两党关系进入恶化的高潮,先是18日蒋接见美国驻华大使詹森时,把共产党问题作为其两个危机之一,说“此实为当前严重问题”,并说:“我人不惧外敌日本军队之侵略,且自信足以制之,而我国弱点,以后当在国内中共之猖狂。”<sup>①</sup>显露了他一意对付共产党的心态。接着国民党19日发出致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的皓电,国共摩擦进一步升级。31日蒋在日记中写道:“我如实力再损,则俄必助中共组织中国苏维埃人民政府,令其与倭妥协,以遂其消灭国民党与国民政府之阴谋;但只要我能维持既有实力,则俄亦不能积极加害于我。”<sup>②</sup>从中不难看出蒋保存军事实力之用心。在国民党反共方针强化的情况下,国共关系进一步恶化,终于酿成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此时,国际形势也发生巨变。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正式形成,世界两大阵营已经分明,这为蒋寻找盟友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此后蒋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英美等国援助和参战上。他在给各战区将领的手令中认为《柏林协定》的出现,是“抗战最后胜利唯一的转机”,“日寇分兵力弱,无力西进,可以放心,只有等候国际局势之转变,期待美英苏合作,造成最后胜利”。<sup>③</sup>11月1日,蒋向英美两国提交中英美三国合作方案<sup>④</sup>,这是他寄抗战胜败于英美两国援助和参战政策的具体化。

综上所述,故笔者认为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是从冬季攻势失败后的1940年初开始的。

(作者单位: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责任编辑:刘兵)

① 《蒋委员长在重庆接见美国驻华大使詹森谈话纪录》,见前引书。

② 《蒋总统秘录》,第2660页。

③ 转引自宋平:《蒋介石生平》,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09页。

④ 《蒋委员长二十九年十一月致驻美代表宋子文冬电》,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一),第107—108页。